

近來，中國大陸的學術界和媒體關注所謂「國進民退」的現象。到底有無這一現象，或者這一現象在哪些社會經濟領域中以何種程度存在？這一現象的發生對於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究竟有何深遠的影響？尤其是，這一現象的出現對於中國政府的轉型甚或逆轉型究竟有何意義？我刊歡迎海內外讀者就這些關涉中國發展的現實問題，踴躍撰文！

——編者

## 讀鄭宇碩的〈十七大以來的中國外交政策〉

本世紀初中國所面臨的國家環境與改革開放初期已經不同，西方國家一邊要聯手制衡中國，一邊又加速把中國變成「世界工廠」，主導了經濟全球化。中國現任領導人的外交課題就是如何面臨這一新的全球格局，於是出現了包含「新安全觀」與「國際關係民主化」的「和諧世界觀」。

「新安全觀」的實質是共同安全的理念，這是基於對世界不同國家與地區的多元性的認識而提出來的，當也包括東亞文明安全之義，而「國際關係民主化」則隱含了對西方價值觀外交的拒斥。無論西方還是東方，外交與內政已經不能截然分開。

對中國來說，「崛起」並不意味著要加入西方的陣營，而是東亞文明整體的重生。「國際關係民主化」的訴求在東亞地域的重新整合上則是要實現東

#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亞文明的整體安全，新上台的日本民主黨提出的東亞共同體的設想，對中國來說，既是「國際關係民主化」的進程，又是國內民主化的契機。民主化可以帶來東亞文明的整體安全，而對東亞文明現代價值的認同又會促進內部的民主化進程，如何出棋，是對今後中國外交與內政的考驗。所有這些，似乎都是鄭宇碩的〈十七大以來的中國外交政策〉（《二十一世紀》2009年12月號）一文未加重視的重要議題。

楊際開 臨安

2010.1.12

## 問題錯綜複雜 主義難免蒼白

薛力的〈中國對東盟的外交：一種建構主義的剖析〉（《二十一世紀》2009年12月號）回顧了新中國對東盟外交的發展軌跡，試圖用建構主義來解釋以往六十年的變化緣由。正如作者所強調，這個理論框架比起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更有說服力，因為後兩者就無法解釋，譬如說，為何中國對東盟外交在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之間存在重大差異。相比

之下，建構主義凸顯了中國的「國家身份變化」，特別是國家領導人的觀念變化這樣的主動變量，體現了更大的靈活性，展示了更強的解釋力。這是薛文的價值所在。

但進而言之，筆者又不贊成單純地用某一大主義來觀察歷史，因為那樣要麼排斥其他有益的視角，並難免有削足適履之虞，要麼不過就是用理論作點綴，無益於深入的研究。事實上，這裏的「建構主義」等於是「沒有主義」，它取消了其他兩個主義，自己同時陷於「沒有主義」，因為既然強調中國對東盟外交隨着「國家身份」甚至領導人意志的變化而一直在不斷變化，那等於是說除了變化本身之外，沒有甚麼一以貫之的主義在在。所幸者，這反倒開啟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之門。

就研究中國對東盟的外交而言，以東盟各國情況之錯綜複雜，加上六十年間世事之跌宕起伏，沒有哪個理論框架可以囊括一切。也許還是應該少套主義，多作具體分析；少貼標籤，多作實證考察。例如，筆者對文中的核心概念，即分別用來描述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中國的「國際主義國家色彩

的民族主義國家」、「地區主義國家色彩的國家」此類說法，也持保留態度。借用理論或概念當然能夠獲得啟發，有時也便於抓住問題的要害，但它們多有局限性，更不能代替具體而微的研究。

梅俊杰 上海  
2010.1.16

## 期待制度的鳳凰涅槃

拜讀完丁偉的〈中國軟力量的思考〉（《二十一世紀》2009年12月號），筆者第一個反應是該文好像對軟力量中的重要元素——制度思考得不多。而對於軟力量而言，制度甚至遠遠比丁偉着墨較多的民族團結、發展模式、核心價值等元素，發揮着更大的決定性作用。竊以為，中國軟力量的真正提升唯能指望制度的鳳凰涅槃，沒有法律制度在中國的超度生根，成為規範人人日常行為的指南，中國的國力難以在現有基礎上再度攀高。

丁偉說，有甚麼令少數族裔安於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份子並引以為榮？不是多數族裔（漢族）的文化傳統，而是這個國家的制度、思想、價值、文化發展、社會道德。遺憾的是，丁偉在全文中幾乎未就制度問題略論一二。當然，制度問題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充分談論的，但沒有談論和未充分談論是性質不同的問題。

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在樣貌上有點像澳洲的袋鼠，「經濟」這隻前腳決定了成就的大小，而「政治」這隻後腿處於明顯的先天失調狀態，始終不能與經濟前蹄並駕齊驅，導致

整個國家的發展時時、處處遭遇政治後蹄的瓶頸和障礙。

決定性的制度問題主要有：包括憲法在內的法律如何能在政治實踐中被嚴格遵守而不被黨的精神、政府政策、中心工作等臨時性的舉措所排擠甚或替代；社會公眾如何能有效參與政治社會的決策；信息能否得到最大可能的公開；與實體性權利相比，程序性權利可否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司法部門能否從當前的政務性質部門轉變成為制約政務部門的中立力量，等等。

中國歷來都是制度的力量孱弱不堪，使社會長期淪落至周期性的政治動蕩和暴力革命。如今，隨着「倉廩實」而來的是「知禮節」——對通過控制權力而保障人權和尊嚴的願望與需要。沒有在滿足這種願望和需要的方向的持續努力，中國軟力量的成長必將面臨滯脹。

劉練軍 杭州  
2010.1.12

## 無意識中的偏狹

姚新勇的〈民族政策的錯亂與族群衝突的激化〉（《二十一世紀》2009年12月號）一文，是從國家政策層面討論中國族群問題的，但筆者卻看到了包括筆者在內的不少漢族知識份子的缺陷——極少關心邊疆少數民族的命運和處境。我們主觀上並無故意，但無意識中卻把邊疆、西域僅僅視作美麗的、有着奇風異俗的觀光之地和文化博物館。我們關注自由民主，關注社會公正，卻極少把這些視野中的同樣的眼光，投向邊疆、西域的少數族裔兒

弟。我們習慣於把漢族的處境誤當作整個中華民族的處境。

正是少數幾位漢族知識份子的寫作，讓筆者感到了自己無意識中的偏狹，而這「少數幾位」就包括姚新勇。也許正是生於新疆、長於新疆，姚新勇才從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顯學專業，轉向了明顯冷僻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並進而走出學院的學術生產機制，邁向了關注中國少數族裔問題和邊疆族裔問題的不歸路。姚新勇不僅揭示和批判大漢族主義的隱性情結，也揭示和批評少數族裔中不當的極端傾向，對於政府少數民族政策及治理方式中的許多問題更給予直言不諱的批評；而所有這一切，又都是在一種同情和理解的態度下進行的。他憑着一個學者的道德良知和學術理性，用心寫下的大量文字，包括規範的學術論文，卻大多無法見諸平面媒體或學術期刊。

〈民族政策的錯亂與族群衝突的激化〉就是一篇直言批評政府民族政策錯亂及其與族群衝突激化之關係的文章。但在直言不諱的批評中，細心的讀者也會發現，姚新勇對錯亂的民族政策的制訂初衷和良善動機，還是給予充分體察和理解的，表現了一位學者的公正和理性。而正是這種理性和公正，才使被批評的對象更加令人驚心，因為那是產生於「無知」而非「有意」，是在喪失起碼的平衡力後不受制約的「傲慢」與「膨脹」。

張寧 廣州  
2010.1.15